

论藏缅语的反响型名量词^{*}

戴庆厦 蒋颖

(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反响型量词是研究量词的关键。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具有能产性; 二是语法功能超过语义功能; 三是具有中介性。反响型量词在发展中从“语音语法”模式走向“语义语法”模式。

〔关键词〕 藏缅语; 反响型名量词; 个体量词; 词汇化

〔中图分类号〕 H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5) 02-0124-06

反响型量词 (echo classifiers)^① 是指与被限定的名词或动词形式相同 (或部分相同) 的量词。反响型量词在藏缅语族 (以下简称藏缅语) 许多语言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它起源较早, 性质特殊, 在量词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过去对它的研究, 多集中在单一语言上, 不同语言的综合研究较少, 因而研究还不够深入。反响型量词主要出现在名量词上, 在动量词上也有少量分布, 但二者的性质、特点很不相同。^② 本文主要通过名量词内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比较, 综合考察多种语言反响型量词的特点, 在梳理藏缅语反响型名量词分布、分类的基础上, 探讨反响型量词的性质、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一、反响型名量词的分布和分类

反响型名量词虽然在藏缅语许多语言里都有, 但其特点和演变规律不尽相同, 同一语言内

部反响型量词的发展也不平衡。为了更好地揭示反响型名量词的性质, 有必要先分析其在不同语言中的分布和分类情况。

在藏缅语里, 有反响型名量词的语言有: 独龙族、缅语、阿昌语、仙岛语、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怒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基诺语、纳西语、纳木兹语、土家语等。这些语言的反响型名量词, 发达程度差异较大。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发达型、半发达型和不发达型。

所谓“发达型”, 是指该语言绝大部分名词都能够充当反响型量词, 构成一个开放的、繁衍能力强的反响体系。如哈尼语即属此类型。它不仅本语名词能构成反响型量词, 借词也能用做反响型量词。如: a³¹ŋ¹i⁵⁵ (妹妹) tɕhi³¹ (一) ŋ¹i⁵⁵ (个) “一个妹妹”; pi³¹ (笔) tɕhi³¹ (一) pi³¹ (支) “一支笔”; pe⁵⁵ tɕ⁵⁵ (飞机) tɕhi³¹ (一) tɕ⁵⁵ (架) “一架飞机”。所

〔收稿日期〕 2004-10-18

〔作者简介〕 戴庆厦 (1935—), 男, 福建仙游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

蒋颖 (1973—), 女, 湖北宜城人, 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003 级博士生。

* 本文写作过程中, 曾与胡素华、李泽然、木仕华、杨将领等藏缅语专家讨论过, 得到一些启发, 特此致谢。

① 反响型量词在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的称法, 如拷贝型量词、反身量词、回应量词、临时量词、专用量词等, 不同的称法反映了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反响型量词的认识。“拷贝型量词”是从量词来源特点取名, “专用量词”或“临时量词”是从量词的功能取名。我们采用反响型量词这个称法, 是从结构形式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 这也是目前比较通用的一种称法。

② 从功能上看, 反响型量词可以分为反响型名量词和反响型动量词两类。二者之中, 以反响型名量词居多, 反响型动量词较少。二者在构成数量短语时, 其语序也不相同: 名量词位于名词之后, 动量词位于动词之前。如独龙族: ŋɛʔ⁵⁵ (眼睛) ti⁵⁵ (一) mɛʔ⁵⁵ (只) “一只眼睛”; ti⁵⁵ (一) kla⁵⁵ (脚) kla⁵⁵ (踢) “踢一脚”。但就具体的语言而言, 只有少数语言反响型名量词和动量词这两种类型都具备, 大多数语言只有反响型名量词, 而没有反响型动量词。所以, 以往有关反响型量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响型名量词上, 也许是源于这种分布情况。

谓“半发发型”，是指只有一部分名词能当响应型量词使用，是半开放的响应体系。属此类型的语言有缅甸语、阿昌语、载瓦语等语言，它们之间的响应能力还存在不同的层次。所谓“不发达型”，是指只有极少数名词能够充当响应型量词，彝语、土家语即属此类型。如彝语只有少量双音节名词能够构成响应型量词，而且都是取后一音节。如： $\text{ɿ}^{31} \text{tɕi}^{33}$ （树叶） tɕh^{31} （一） tɕi^{33} （片）“一片树叶”； $\text{zo}^{33} \text{bo}^{33}$ （树） tɕh^{31} （一） bo^{33} （棵）“一棵树”。

藏缅语中有些语言没有响应型量词，如景颇语、藏语等。这些语言与有响应型量词的语言相比，在语法上的主要差异是数量词语序不同。有响应型量词的语言通常是“名+数+量”语序；没有响应型量词的语言通常是“名+量+数”语序。前者句法上的分析性特点大多比后者突出。

以上是就不同语言响应型名量词的分布情况而进行的分类。但就响应型名量词本身而言，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存在内部类别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做不同的分类。

从形式上看，响应型名量词可以分为整体响应型和部分响应型两类。前者是指取名词的整体来做量词；后者是指只取名词的某一个音节。如果名词是单音节的，各语言都采用整体响应的方式，即量词与居前的名词语音形式完全相同。如：波拉语的 la^{231} （手） tɕ^{31} （一） la^{231} （只）“一只手”；独龙语的 wɛt^{55} （花） ti^{55} （一） wɛt^{55} （朵）“一朵花”； tɕam^{55} （桥） ta^{31} （一） tɕam^{55} （座）“一座桥”。如果名词是多音节的，量词有取名词后一音节的，有取前一音节的，也有取整体的。如：哈尼语的 $\text{za}^{31} \text{jo}^{33}$ （男人） tɕi^{31} （一） jo^{33} （个）“一个男人”，量词取名词的后一音节； $\text{lo}^{55} \text{ba}^{31}$ （河） tɕi^{31} （一） lo^{55} （条）“一条河”，是取前一音节。通常以取后一音节的居多，但哈尼语没有整体响应的。独龙语以整体响应为主，也有取后一音节的。 $\text{du}^{31} \text{glu}^{53}$ （筷子） ti^{55} （一） $\text{du}^{31} \text{glu}^{53}$ （根）“一根筷子”，是整体响应。 $\text{ɿ}^{55} \text{a}^{55} \text{ku}^{55}$ （肉块） ti^{55} （一） ku^{55} （块）“一块肉”，是取后一音节。纳西语这几种拷贝类型都具备，而且同一个名词有不同的响应方式，可以整体响应，也可以部分响应。如： $\text{kho}^{33} \text{lo}^{33}$ （洞） du^{33} （一） kho^{33} （个）“一个洞”，是取前一音节； $\text{ku}^{33} \text{ly}^{33}$ （头） du^{33} （一） ly^{33} （个）“一个头”，是取后一音节； $\text{kho}^{33} \text{lo}^{33}$ （洞） du^{33} （一） $\text{kho}^{33} \text{lo}^{33}$

（个）“一个洞”，是取名词整体。

从典型性上看，响应型名量词可分为典型响应型和非典型响应型两类。典型响应型名量词，是指与被限定名词的语音形式相同（或部分相同）的专用量词。专用，就是只能固定用于一个被限定的名词上，不能扩大到其他名词上。如浪速语： jam^{31} （房子） tɕ^{31} （一） jam^{31} （间）“一间房子”，其中的量词 jam^{31} “间”来自名词 jam^{31} “房子”，就只能用在 jam^{31} “房子”上，不能用来表示其他任何名词的量。如果某一个响应型名量词能够限定数个同词根的名词，它就已经演变成类别量词或性状量词，不再是典型的响应型量词，而是非典型响应型量词。如哈尼语的 $\text{a}^{55} \text{bo}^{55}$ “树”、 $\text{ɿ}^{31} \text{bo}^{55}$ “桃树”、 $\text{tɕ}^{31} \text{su}^{31} \text{a}^{55} \text{bo}^{55}$ “松树”等词，量词都取后一音节 bo^{55} ，构成非典型的响应型量词“棵”，多少已含有称量树木类的类别意义。但 bo^{55} “棵”还不能脱离带有 bo^{55} 词根的名词独立使用，说明它仍具有响应型量词的特点。

把响应型量词分为典型和非典型两类，对于认识响应型量词的性质和演变是有价值的。因为，由于典型性不同，二者的语法意义及概念意义也不相同，而且二者在发展上，存在一定的承接关系。

二、响应型量词的性质与特点

每个实词都有其语法意义和具体的概念意义（又称理性意义），名量词也是如此。但是还必须看到，语法意义不是只有一个层次，而是有着抽象程度不同的多个层次。这个认识对于名量词的分析，特别是对响应型量词性质的认识很有必要。因为名量词虽然属于实词，也具有实词的一些基本特点，但与名词这样的实词相比，它在语法意义和概念意义上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事物的计量单位”，是对名量词意义所做的最高层次的概括，每个名量词首先都必须具备这一语法意义，才能够与其他词类相区别。除此之外，名量词内部的不同小类，如度量衡量词、个体量词（个体量词内部又有响应型量词和非响应型量词两类）等，除了具有共同的最高层次的语法意义之外，还各自具有抽象程度较低、层次不同的语法意义。如度量衡量词，具有“表示事物约定俗成量或法定标准量的单位”的语法意义；

部分个体量词，具有“表示事物的类别、性质、状态”等的语法意义。概念意义是对每一个具体的词而言的，即每一个实词除了具有语法意义外，还都具有固定的非开放的概念意义。如汉语量词“面”，其最高层次的语法意义是“事物的计量单位”；其较低层次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事物性状的类”；其概念意义是表示“量所属的具体事物是扁平的或能展开的物件（如镜子、红旗、墙、纸张等）”。又如载瓦语的 \int_{ham}^{21} “个、颗、粒、丸”，其较高层次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个体的量”，较低层次的语法意义是表示“具有某一类形态的名词的量”，概念意义是表示“量所属的具体事物是圆粒形的物体（如谷子、梨、药丸等）”。

反响型量词是个体量词的一种，但与其他个体量词相比，二者的性质有较大差异。非反响型个体量词用来称量名词时，除了带有高层次和低层次的语法意义外，都还有较明显的概念意义。与非反响型个体量词一样，反响型量词也有表示“称量名词的单位”的语法意义，但在概念意义和低层次的语法意义上，二者有重要的差异。如下表所示：

类别 \ 意义	语法意义		概念意义
	高层次	低层次	
典型反响型量词	+	—	—
非典型反响型量词	+	(+)	+
非反响型个体量词	+	+	+

典型的反响型量词是最早出现的个体量词，也是最原始的个体量词。它已具有称量名词的语法功能和高层次的语法意义，但还没有其他量词所具有的概念意义，因而也没有标示名词类别、性质、状态等低层次的语法意义。这是典型的反响型量词区别于其他个体量词的个性所在。

从反响型量词的取材方式上，也能证明最早产生的典型反响型量词是没有概念意义的。反响型量词来自名词，若量词是整体反响型，它很难衍生出新的语义，因为反响型量词和原型名词是一对一的专用关系，而且是临时使用的，必然会受到名词语义的限制，难以产生量词的概念意义。若量词是部分反响型，反响型量词只取名词中的一个音节，这一个音节可能有意义，也可能

没有意义，即使有意义也与量词概念意义无关。如哈尼语：

$t_{\Omega}^{31} b_{ja}^{31}$ （喜鹊） t_{hi}^{31} （一） b_{ja}^{31} （只）一只喜鹊

$dze^{55} dzu^{31}$ （茄子） t_{hi}^{31} （一） dzu^{31} （个）一个茄子

b_{ja}^{31} “只”与“喜鹊”的意义无关， dzu^{31} “个”与“茄子”无关。特别是意义上并无关联但有一个相同音节的多个名词，这样的名词称量时就会使用相同的反响型量词。这种一词多用，肯定与意义无关。如哈尼语：

gu^{31} （个、块）：
 $za^{31} gu^{31}$ （小孩） t_{hi}^{31} （一） gu^{31} （个）一个小孩
 $n_{u}^{33} gu^{31}$ （豆腐） t_{hi}^{31} （一） gu^{31} （块）一块豆腐

名词“小孩”和“豆腐”都能由 gu^{31} 称量，不是因为 gu^{31} 能在意义上联接它们，而只是反响形成的巧合。这不同于非典型的反响型量词可以用在数个同词根名词的称量上。

正因为最初的个体量词是不含概念意义的，所以，至今量词尚不发达的语言如藏语、景颇语等，个体量词可用也可不用，并不影响表义。如景颇语：“一个人”可以说 $m\ddot{a}^{31} \int a^{31}$ （人） $m\ddot{a}^{31} \int_{u}^{33}$ （个） $l\ddot{a}^{55} t_{hi}^{51}$ （一）“人个一”，也可以说 $m\ddot{a}^{31} \int a^{31}$ （人） $l\ddot{a}^{55} t_{hi}^{51}$ （一）“人一”，二者的意义完全相同。在有数词做修饰语的名词短语中，由不使用量词的零形式执行个体量词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在很多个体量词不丰富的语言里面都能看到，这是量词的语言共性之一。上述零形式和加个体量词两可的情况说明，个体量词的概念意义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增添上去的。

而非典型的反响型量词，同样具有高层次的语法意义，还在发展中同时增添了概念意义，并进而有了标示名词类别、性质、状态等低层次的语法意义。但它只能用于数个同根名词上，不能超出语音形式相同的范围。说明这种低层次的语法意义，是从语音结构形式概括出来的类别，而不是从语义、语法概括出来的。这与其他从语义语法角度概括出来的低层次语法意义不完全相同，所以上表中用加了括号的（+）表示，以示区别。

一部分非反响型个体量词来自于非典型的反响型量词，是非典型反响型量词进一步语法化的

产物。其标志是该量词已经突破语音形式相同的限制，能与非同根名词相结合，表示有共同性质、形状等特点的一类名词。非响应型个体量词和非典型的响应型量词都有概念意义，也有高低两个层次的语法意义，但二者在低层次的语法意义上有差异。前者在表量的同时，兼表类别、性质、状态，在使用上与名词的意义挂钩，而不是与名词的语音形式挂钩，因而不受名词的语音形式制约。以阿昌语为例，下面的非典型响应型量词“tse^{ɿ̃⁵}（棵）”用在数个属于树木类的名词上，既是语音响应，又有类别意义，但这个类别意义是语音相同的结果：

xai^{⁵⁵} tse^{ɿ̃⁵}（柳树） ta^{³¹}（一） tse^{ɿ̃⁵}（棵）一
棵柳树

piak^{³¹} tse^{ɿ̃⁵}（松树） ta^{³¹}（一） tse^{ɿ̃⁵}（棵）一
棵松树

但非响应型个体量词与此不同，它不考虑语音形式不相同，只考虑语义上的关联。下例的“lum^{³¹}（个）”与名词无语音联系，可称量圆或椭圆形的水果类名词：

ʂo^{³¹}（果子） ta^{³¹}（一） lum^{³¹}（个）一个果子
ʂo^{³¹} om^{³¹}（桃子） ta^{³¹}（一） lum^{³¹}（个）一个
桃子

非响应型量词因为含有与名词相关的概念意义，因而在句中使用时，可以省略名词，直接与数词结合，构成指称名词的数量短语，充当句法成分。而响应型量词或者没有具体的概念意义，或者有概念意义但主要从语音角度获得类别、性状的语法意义，所以，表义上的不充足或不清晰使它不能像其他量词那样可以脱离名词使用。如载瓦语：

1 a. ɰ^{⁵¹}（我） pu^{²¹}（上衣） i^{⁵⁵}（两） tu^{ɿ̃¹}
（件） vut^{²¹}（穿）。我穿两件衣服。

b. ɰ^{⁵¹}（我） i^{⁵⁵}（两） tu^{ɿ̃¹}（件） vut^{²¹}
（穿）。我穿两件（衣服）。

2 a. ɰ^{⁵¹}（我） lo^{²¹}（手） i^{⁵⁵}（两） lo^{²¹}（只）
vo^{⁵⁵}（有） le^{⁵¹}（助词）。我有两只手。

b. *ɰ^{⁵¹}（我） i^{⁵⁵}（两） lo^{²¹}（只） vo^{⁵⁵}
（有） le^{⁵¹}（助词）。我有两只。

例1a、例1b中的 tu^{ɿ̃¹}“件”是非响应型量词，可以脱离名词使用。例2a中的 lo^{²¹}“只”是响应型量词，必须与数词、名词结合使用。例2b在句法上是合法的，但没有明确的句义，因

为句中的响应型量词 lo^{²¹}“只”脱离了名词，没有确定的上下文。由此可见，语用差异是响应型量词与非响应型量词的重要差异之一。

根据以上的分析，响应型量词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具有能产性。特别是典型响应型量词是开放的，能以最简便、快速、经济的方式大量产生新的量词，新的名词（包括借词）一出现，就能产生相应的量词。二是其语法功用超过语义功用。特别是典型响应型量词还不具有概念意义，是语音和语法的结合体。三是具有中介性。响应型量词作为早期的个体量词，在整个量词体系的发展中，处于中介地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响应型量词的形成和发展

响应型量词是研究量词的关键。因为它是个体量词中最早出现的一类，它的形成和发展对其他类别的量词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典型的响应型量词还保留了个体量词的原始特点，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探讨量词的发展脉络。那么，没有概念意义只有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的典型响应型量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藏缅语最早出现的量词是非标准的度量衡量词和集合量词，响应型量词是随后产生的。有两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词源上的证据。藏缅语诸亲属语言之间，量词同源的比例很少，但非标准度量衡量词和集体量词有的还有同源关系，由此可见它们是最早产生的量词。如：

度：景颇 la^{³¹} lam^{⁵⁵}，独龙 lam^{⁵⁵}，缅 lam，阿昌 lam^{⁵⁵}，仙岛 lam^{⁵⁵}，载瓦 lam^{⁵¹}，怒 lam^{³¹}，彝 la^{³³}，哈尼 p^{⁵⁵}，纳西 ly^{²¹}，嘎卓 k^{²⁴}

双：藏 tʰa^{⁵⁵}，木雅 tʰe^{⁵³}，吕苏，景颇 tsum^{³³}，独龙 dʰum^{⁵⁵}，阿昌 tɕm^{³¹}，载瓦 tsum^{⁵⁵}，浪速，波拉，勒期，怒 dza^{³³}，彝 dʒi^{²¹}，傈僳 dʒe^{³¹}，拉祜，哈尼 dɔ^{⁵⁵}，纳西 dɿ^{³³}，克伦 dzu^{³¹}

但典型响应型量词由于它是每个名词专用的，所以除了少数有同源关系的名词外，一般都不存在同源关系。

二是认知上的证据。从认知角度看，最初出现的量词也应该是非标准的度量衡量词。因为原始人要表示如度量衡、集体这样的单位，就必须产生专门的量词来表示它们。“一度柴”中的量

词“度”，指的是“两手平伸形成的长度”的量，如果缺少“度”这一量词说成“一柴”，那就成了另外的意思。同样，“一双手”中的“双”也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个体量词则不同，没有它，数名短语也包含了量的意义。

度量衡量词和集合量词的产生，为个体量词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因为最早出现的度量衡量词和集合量词，在量词的发展中起到了两个作用，一个是表示量，一个是提供量词的语法模式。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是量词由无到有的质变。由于度量衡量词和集合量词的出现，原有的“名+数”模式演变为“名+量+数”或“名+数+量”的模式，这为个体量词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必要的句法位置。可见，语法模式的类推机制是个体量词最初出现的必要前提。

但是，单有语法模式的类推机制是不够的，还要有表音清晰度的需求。因为，机制只是前提，表音清晰度的要求才是诱发个体量词（包括反响型名量词）产生的决定性力量，是个体量词产生的直接动因。^① 藏缅语中，凡是数词是单音节的，个体量词就比较发达；数词是多音节的，个体量词就不够发达或者极少。显然，单音节数词在使用中，表示数量的清晰度不够，要增加一个量词来加强它的清晰度。而且，藏缅语在历史发展中，有着共同的韵律要求，体现出双音节化的特征，而单音节个体量词伴随着单音节数词出现，也正顺应了这个结构双音化的潮流。反响型量词是个体量词的一类，它具有个体量词的基本特点，反响型量词就是沿着上述的演变规律而产生的。而且，在有反响型量词的语言里，典型反响型量词是较早出现的一类个体量词，^② 与非反响型量词相比，它只有量词的语法功能，没有概念意义，其语音节律的作用更为突出。

典型反响型量词只表语法意义、不表概念的基本属性，与分析性特点日益加强的藏缅语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因而，它要继续生存、发展下去，就必然要从“语音语法”模式转向“语义语法”模式。在有反响型量词的藏缅语里，我们看到有一些语言的典型反响型量词已经有了这种模式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两个转换阶段：第一个

发展阶段是由典型的反响型量词向非典型的反响型量词转化。即由专用于一个名词的量词，发展为用于多个同词根的名词上。如哈尼语：

a⁵⁵ si³¹ (果子) tɕhi³¹ (一) si³¹ (个) 一个果子
a⁵⁵ tɕhu⁵⁵ a⁵⁵ si³¹ (芭蕉) tɕhi³¹ (一) si³¹ (个) 一个芭蕉

蕉

si³¹ ɣo³¹ a⁵⁵ si³¹ (桃子) tɕhi³¹ (一) si³¹ (个) 一个桃子

子

第二个阶段是由非典型反响型量词向表示性质、状态、类别的非反响型个体量词转化。如上例中的“si³¹”可以进一步向非反响型量词转化，用于没有“si³¹”词根的其他名词上。例如：

la³¹ phi⁵⁵ (辣子) tɕhi³¹ (一) si³¹ (个) 一个辣子
be⁵⁵ lo⁵⁵ (槟榔) tɕhi³¹ (一) si³¹ (个) 一个槟榔
ɣo³¹ phu⁵⁵ (萝卜) tɕhi³¹ (一) si³¹ (个) 一个萝卜

又如载瓦语的 lum²¹“个”（指圆形物），原出于 nik⁵⁵ lum²¹“心脏”的后一音节，后扩大到用于有圆形特征的一类名词上。例如：

mu²¹ (斗笠) lã²¹ (一) lum²¹ (个) 一个斗笠
po²¹ lo²¹ (球) lã²¹ (一) lum²¹ (个) 一个球
mjo²¹ ɬi⁵⁵ (眼睛) lã²¹ (一) lum²¹ (只) 一只眼睛

由上可以看出，反响型名量词曾经历过由“语音语法”结合体向“语义语法”结合体发展的过程。与语法化过程相反，这是一个由虚到实的发展过程，可以称之为“词汇化”过程。语法化是由实到虚，词汇化则由虚到实。从整个过程来看，藏缅语个体量词（包括反响型量词）都经历了先词汇化（由虚到实，增添概念意义），再语法化（扩大适用范围，语义泛化）的发展道路。词汇化的结果，使得反响型量词和非反响型个体量词出现并用。久而久之，并用双方出现了竞争和分工。如载瓦语：

mjo²¹ ɬi⁵⁵ (眼睛) lã²¹ (一) ɬi⁵⁵ (只) 一只眼睛

mjo²¹ ɬi⁵⁵ (眼睛) lã²¹ (一) lum²¹ (只) 一只眼睛

sik⁵⁵ (树) lã²¹ (一) sik⁵⁵ (棵) 一棵树
sik⁵⁵ (树) lã²¹ (一) kam⁵¹ (棵) 一棵树
pu²¹ (裤子) lã²¹ (一) pu²¹ (条) 一条裤子
pu²¹ (裤子) lã²¹ (一) tu²¹ (条) 一条裤子

① 许多非汉藏语系语言里也有度量衡量词和集合量词，也有语法上的类推机制，却无法产生出个体量词。这是一个旁证。至于有少数语言数词是单音节的，但个体量词也不发达，这种例外有的可能与该语言数词的古代语音状况有关。

② 汉语甲骨文里出现的“羌百羌、人十人”等反响型量词也说明反响型量词是较早出现的。

二者的分工主要是：若要强调事物的性质、状态、类别，用非反响型量词；只需要表示事物的数量而不强调事物的特征时，就用反响型量词。

四、余论

上面我们就反响型量词的一些基本特征做了初步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反响型量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下面进一步就在研究中未能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认识。

1. 反响型名量词与反响型动量词的关系。以往研究反响型量词虽然重点都放在反响型名量词上，但有的研究也涉及反响型动量词。其实，二者在来源、语音结构及发展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如：在来源上，前者均来源于名词，而后者均来源于动词；在语音结构上，前者基本上是量词和名词呈以数词为中轴的对称分布状态，而后者是量词和动词相连，构成重叠状态；在发展演变上，前者的语义能够扩大，有逐步泛化的发展

阶段，而后的语义不能扩大，没有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反响型名量词与语序的关系。如上所述，藏缅语大部分语言有反响型量词，而有些语言没有。藏缅语数量词修饰名词主要有两种语序，^①一是“名+数+量”，一是“名+量+数”，反响型量词主要出现在前一结构里。但有的“名+数+量”语序的语言，也只有少量的反响型量词，如彝语。彝语中存在的反响型量词极少，是何原因？是原来很丰富，后来衰落消亡了，还是原来就是这种状态，目前尚不得而知。这样看来，语序是否也是反响型量词产生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名+数+量”语序是否蕴含了反响型量词产生的必然性？这些都是今后藏缅语研究必须解决的课题。此外，语序与前文所述的语音清晰度要求之间有何关系，如果它们都是反响型量词产生的条件，那么它们是否存在层次高低的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李宇明. 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J〕. 中国语文, 2000, (1).
- 〔2〕戴庆厦. 藏缅语个体量词研究〔A〕. 彝语研究〔C〕.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
- 〔3〕徐悉艰. 彝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J〕. 语言研究, 1994, (1).
- 〔4〕徐悉艰. 载瓦语的量词〔J〕. 民族语文, 1993, (4).
- 〔5〕孙宏开. 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J〕. 中国语言学报, 1988, (3).
- 〔6〕杨焕典. 纳西语中的数量词〔J〕. 民族语文, 1983, (4).
- 〔7〕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藏缅语语种有关部分)〔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On the Echo Classifiers of Nou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DAI Qing-xia JIANG Ying

(College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Echo classifiers are the key elements in the study of classifiers, and their feature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irstly, they are generable. Secondly, their syntax function is greater than their semantic function. Thirdly, they function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elements. Echo classifiers tend to shift from “phonetic & semantic” pattern to “semantic & syntax” pattern in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ibeto-Burman languages; echo classifiers of nouns; count-noun classifiers; lexicalization

〔责任编辑 宝玉柱〕

① 除这两种语序之外，还有省略数词的“名+量”语序，如彝语：tsho⁴⁴（人）ma³³（个）一个人；pi³¹（笔）tq³³（支）一支笔。